

评《中非发展合作：理论、战略与政策研究》*

胡美 方伟**

近十年来，中非合作交往的独特性日益受到世界的关注，各方学者或引经据典、著书立说，或深入非洲实地考察访问，争论诤辩中非关系迅速发展的秘诀。2011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刘鸿武教授与罗建波博士合著的《中非发展合作：理论、战略与政策研究》（以下简称《中非发展合作》）一书。该书将中非合作关系放在全球体系变革与非洲大陆寻求发展的大框架内进行思考，从理论建构、战略辨析、政策评估的多维向度上，系统及全景式地考析了当代中非合作关系，并围绕着各方学者普遍关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做出了中国学者的独特思考，是近年来在此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对当代中非合作关系的全景式透视

作为欠发达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非洲的发展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自非洲独立以来，围绕着非洲的发展问题出现了多种思想和学说。西方从其自身发展经历与经验逻辑出发，主张在非洲实施西式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改革，但成效似乎并不理想。与西方不同，半个世纪以前，刚从民族解放斗争中走过来、开始谋求民族经济发展的中国，秉持自己的精神理念和文化

*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09JZD0039）、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非洲研究中心、浙江省高校创新团队建设成果。

** 本文作者胡美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教授；方伟系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赞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传统,开始了与新独立非洲国家的交往。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探索,中非双方抱着相互尊重和相等相待的精神,形成了援助、合作、发展三者相结合的特殊新型关系。从目前来看,这一新型关系成效显著,中非双方均从中受益。

与传统的西方援助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援助关系不能建立在单纯的援助基础之上。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尝试,在合作的基础上,中非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共同发展关系,巧妙而成功地跨越了横亘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发展难题。为全面把握这一复杂命题,《中非发展合作》建构了一个精心安排的分析与论述框架。

《中非发展合作》全书由导论和上、中、下3篇构成。在导论部分,作者从当代世界体系转型与人类现代性二次建构的角度,提出了全书将要讨论的一些核心命题与理论假设。

本书上篇“中非合作关系的理论研究”各章,是对当代中非合作关系若干理论、学科、观念与方法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涉及当代中非合作关系的理论探寻、学科建构、视野拓展、方法重塑等重大问题,并就如何理解认知非洲文明之独特性、当代非洲国家建构、民族成长、发展道路及发展动力之选择等重大问题提出了理论性思考框架。

本书中篇“中非合作关系的战略研究”各章,是对当代中非合作关系一些战略性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包括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历史背景、宏观进程、战略目标与全球影响。作者立足当代世界体系变革与亚非文明复兴的开阔视野,透视中非合作关系涉及的种种复杂命题,具有拓展思维的创新意义。

本书下篇“中非合作关系的政策研究”各章,是对当代中非合作关系政策层面的思考,涉及当代中非合作关系在一些具体领域的政策选择、路径调整、措施完善、机制建构等问题。这一部分的内容,呈现了中非合作关系所具有的强烈实践性与政策性特点,彰显了中国学术传统之经世致用理想及现实抱负。

总体来说,《中非发展合作》认为,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变,随着中非双方国内变革的推进及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演变,中非双方在互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一种以互利发展为基础的合作关系,而这一关系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往的各种国际援助模式,具有指向未来的时代创新意义。

深度挖掘中非合作关系的理论意义

非洲是否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大陆？位居亚洲的中国为什么要与遥远而贫穷的非洲建立起如此长久而日渐紧密的合作关系？对人类发展问题而言，中非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哪里？《中非发展合作》的导论就是带着这些问题展开的。

由于西方发展模式与西方理论体系长期以来处于主导地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主导了学术界对于现代性的理论阐释，支配着非洲与中国这样非西方世界的当代发展问题的探讨。我们观察到，国际学术界因长期处于西方理论及其话语体系的垄断和支配之下，一些基本的理论框架与知识标准均渗透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在作者看来，唯有在基本的理论建构与话语体系上有所突破，并形成新的知识工具与诠释模式，才能准确认知和全面把握快速发展的中非合作关系的性质与意义，解答人们心中的重重疑惑。

从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上看，与中华民族一样，非洲大陆各民族都曾在人类历史上书写过光辉灿烂的篇章。但自近代以后，相对于快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非洲各国，其发展的步伐日渐缓慢甚至出现了停滞。这曾一度让西方中心主义者认定，非西方世界的发展已经没有希望了。但这并非事实，世界历史向现代文明过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正如《中非发展合作》导论中强调的，“在西方开始的现代性成长进程只是整个更为复杂、更为漫长的人类现代性成长大历史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而不可能是全部。”^①

与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文明观及对非洲大陆的悲观论相反，中国学者对于非洲大陆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信心与期待。本书作者刘鸿武早年留学非洲，是改革开放后首批走进非洲并在回国后长期潜心非洲研究的中国学者之一，另一位作者罗建波则是近年来崭露头脚的后起之秀，师从刘鸿武行走非洲，深受其思想的影响与熏陶。也许就是这种留学非洲的经历和长期潜心非洲研究的独特积累，让本书的两位作者对非洲具有了较一般学者更为深刻的认识

^① 刘鸿武、罗建波著：《中非合作发展：理论、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与独到的理解。就刘鸿武的经历看,多年来不断深入非洲、了解非洲、聆听非洲、感受非洲的过程,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学术灵感和思想源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长期与非洲的近距离接触,刘鸿武眼中所看到的非洲,不同于一些西方学者所观察的蛮荒与落后的表象,而是在不同的领域里具有超越西方文化的元素。作者心中没有西方学者所具有的傲慢和偏见,反而充满了敬意和温情,在用自己的心灵阅读非洲、体验和理解非洲的发展。他一直主张用“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和非洲的发展。^①他相信,每一种文明背后都蕴藏着获得发展的基因和动力,问题只在于这种基因与动力何时被激发并发挥作用。因此,作者在一开篇就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提出,每一种文明的演变和发展进程都是“曲折与多元”的,虽然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最初的突破发生在西欧”,之后这些国家引领并支配了近代世界的发展。包括中国和非洲在内的亚非拉世界则遭到了西方的冲击和影响,“先行经历了一个自身文明瓦解沉沦,社会被动解体,国家民族发展被边缘化的痛苦过程”,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人类现代性成长的世界文明变革进程完全开始于并已经终结于西方。^②

长期以来,西方文明在近代以后人类发展阶段处于暂时领先地位,让众多学者对人类现代文明及其属性产生了错误的判断,以为西方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唯一主导者与推进者。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韦伯再到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学说笃信者,“西方中心论”似乎成为西方学界一种主导性思维逻辑,并深刻影响了世界其他国家主要的学术流派。然而,“西方中心论”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在解释西方的发展时具有很强的诠释力,它却漠视了非西方世界在这段时间内持续不断的复兴努力,漠视了中国和非洲各国在探索发展路径、找寻发展模式上为人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而要敏锐把握这一新的世界历史变革趋势,传统的“西方中心论”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正如作者所判断的那样,今天的非西方世界“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现代发展经验与自信”,它“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甚至文化与观念上”开始崛起,一个平等交往的“新的世界”正在逐步形成。^③

近年来,包括中国和非洲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在人类发展实践中不断获得

① 刘鸿武著:《黑非洲文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② 刘鸿武、罗建波著:前引书,第1~2页。

③ 同上书,第2页。

重大突破，正在逐步印证作者的这一判断。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多元化与多流向变化，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经济体系的日渐向相对均衡性方向的发展，特别是以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世界的新发展，正在孕育人类知识与思想的重大创新机会与源泉。通过对过去百年非西方世界发展进程的考察，作者发现，虽然在今天的国际话语空间，西方的知识和话语体系依然占据优势，但基于西方经验的西方知识和思想体系并不能解决环境与条件更为复杂的非西方世界现代发展问题，反而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各种来自亚非世界新的发展道路选择、新的发展经验与发展难题的挑战”。在作者看来，随着当前中非关系的迅速推进以及中国和非洲的大踏步发展，人类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前景更为开阔的“后西方时代”。^①

在全球发展的“后西方时代”大背景下，中非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交往的基本理念，通过长期的互动与协调、探索与积淀，在交往中发现并充分发掘蕴含在各自民族文化中的发展内应力，发挥自己的文明智慧和聪明才智，探寻实现双方发展的秘诀和契机，中非合作关系日渐获得世人瞩目的成效。“后西方时代”代表着人类发展的多元化新时代，在《中非发展合作》一书中，作者努力突破束缚国人思维的传统“中西二元”思维模式，从一个开阔的全球视野上来理解探寻未来时代人类各民族、各个国家、各种文明间的更为均衡发展，及在此过程中中国对非政策和中非合作关系所具有的开拓性意义。

虽然中非之间成功的合作关系是否能够代表亚非世界的发展新模式，虽然所建构的这种发展新模式是否有效还有待未来历史进一步证实，但《中非发展合作》的重要贡献就在于，通过对中非发展进程及中非关系的深入探索与思考，努力突破多年来主导东西方学术界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范式。对于众多固持西方中心的学者和政客而言，这一突破带来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作者早已预计到，“已习惯自我中心自成体制的西方现代知识系统实际上已经开始面对此前从未遇到过的挑战”。^② 无论如何，这一理论性的突破给包括中国和非洲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增添了诸多未来发展的信心，丰富了这些国家在发展道路方面的选择，大大拓宽了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难

① 刘鸿武、罗建波著：前引书，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3页。

题时的思路。

当前中非发展合作给非西方国家带来的新的发展实践表明,理解这种发展需要有新的知识工具与理论视野。《中非发展合作》对于中非合作的理论探讨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探讨了“后西方时代”基于中非合作关系的中国“非洲学”的建构问题。“后西方时代”不仅超越了“中西二元”思维结构的束缚,而且带来了帮助确立有中国特色的“非洲学”的机会,而非洲研究就是开拓这一学术“新边疆”、构建“中国知识”话语权的特殊契机。由于非洲发展问题的特殊性,当代非洲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正“孕育着人类知识与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与机会”。^①对中国而言,中国特色之“非洲学”的建构,正担负着推动“中国学术研究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使命。在拥有着几十年非洲研究的经验、足迹遍布20多个非洲国家后,对于中国“非洲学”的建构问题,本书作者已形成了清晰的构建思路。他提出的“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治学理念,及倡导的中国非洲学所应遵循的“秉承中国学术传统、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总结中非关系实践”3个维度通融结合的研究路径,可谓是他多年研究非洲的思想精髓,具有特殊的理论建构意义。^②

对中非合作关系的战略省视与思考

如果说《中非发展合作》的第一部分从理论高度来探讨非洲的发展和中非合作关系中的关键问题,第二部分则将重点聚焦于中非双方如何合作以确保双方在合作中的发展利益。有了非洲发展和中非合作的理论背景后,读者再来了解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战略就会深刻得多。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读者不仅可以了解中非合作关系的战略,而且更能深入领会到中国这样做的原因和意图,及其与西方的区别所在。

无论是基于历史考察,还是关注现实来分析,中非合作都是双方为追求自身生存和内在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在双方追求民族复兴、寻找民族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具有战略性与基础性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初,中非关

^① 刘鸿武、罗建波著:前引书,第32~33页。

^② 同上书,第44页。

系就在中国外交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而进入 21 世纪，无论是中国还是非洲，时代都赋予了它们更新的发展任务和使命，合作成为中非在应对这些任务和使命时的共同选择。伴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各种外在的制度和平台建设逐步走向成熟，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2000 年创立的中非合作论坛，开启了中非合作的新时期，是中国发展经济、走向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站在更开阔的世界史高度看待和评价中非关系对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性，称中非关系是“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一个支点”，是“一个影响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结构、改变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的特殊因素”。^①

随着中非合作关系的推进，中非双方在发展合作中创造了良好的效益，而这种效益又成为合作关系继续向前推进的动力。在当代非洲大陆的发展格局中，中国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英国《金融时报》、法国《世界报》均有文章断言，非洲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因素。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非洲而言，中非关系都有着特殊的意义。中非合作推进的过程，就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其外交理念、释放其政策魅力的过程。作者以援非为切入点，通过对中西方援非战略的比较发现，与西方在援非中推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改革不同，中国的援非以“民生改善”优先，因而，冷战结束后，西方和中国在非影响力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在发展中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中国模式在非西方世界的发展中引人注目，而中国并不主张推行自己的发展模式，而是主张各种文明之间互相沟通、相互学习。在作者看来，与西方当年的现代化变革相比较，当前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变革，是一个更为复杂艰难的过程，“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可以替代亚非国家之自主努力而去简单地左右这一进程，规定它的走向”，这是中国坚持在对非合作过程中“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的一个重要原因。^②然而，中国这一做法反而进一步推动了中非之间的成功合作，并且在合作中不断找寻到并构建起更多更新的利益交汇点，拓展出中非合作与赢的新空间。

中非之间越来越紧密的合作关系使得中非双方都获益匪浅。这种共赢关系吸引了众多西方学术界和政界人士羡慕的眼光。正是由于外界的关注，中非关系其实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正如作者所

① 刘鸿武、罗建波著：前引书，第 240 页。

② 同上书，第 204 页。

强调的那样，中非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中国和非洲的双边关系，而是中国和非洲所代表的发展中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变化。^①正是基于中非关系的这一特殊定性，作者并未将中非关系仅仅置于中非双边关系的视野之中来进行考察，而是将之放置在整个亚非发展中世界的角度来考察的，认为中国和非洲的变化“是过去数十年间整个非西方世界或亚非世界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化的一个窗口”，应该将中非关系纳入到亚非世界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高度来进行思考。^②在作者宏大的视野中，中非关系的发展，实际上只是发展中国家自主寻求发展道路、拓展发展路径的一个生动的窗口。实际上，在中非关系发展的同时，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与非洲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个历史少见的高潮。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交往也日益频繁，经济联系日益深化，这种趋势似乎越来越不可阻挡。从全球结构来看，这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变化，而且是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性变革。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交往来获得机会，不再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唯一途径，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可以找到繁荣内部贸易、发展经济的内生途径。而这种内生性发展路径不仅是数十年来中非双方在交往中孜孜追求的目标，更是自20世纪以来非西方世界寻求自我发展过程中持久努力和不断探求的目标所在。

当前，西方经济问题重重、发展前景堪忧，而中非合作关系持续推进日益成为世界发展的一道风景线，正在为非洲的经济复兴带来难得的历史性机遇。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和实践，非洲发展中的“中国因素”逐渐凸现。中非贸易从2000年的100多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290亿美元，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也将是近期可望达成的目标。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非洲成为中国的第四大海外投资目的地。2007年，中国对非洲经济增长贡献率达20%。^③与此同时，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在中国的鼓舞和倡导下，一批新兴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对非洲合作的行列中来，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包括“金砖国家”、“远景五国”、“新钻十一国”等均已成为非洲发展的重要伙伴。它们中的很多国家纷

① 刘鸿武、罗建波著：前引书，第205页。

② 同上书，第173~174页。

③ 魏建国：《在非行年会开发性金融与中非合作研讨会上的讲话》，2007年5月13日，http://finance.ce.cn/dissertation/macro/fh/nh/200705/15/t20070515_11362454.shtml，2011-11-18。

纷复制和模仿中非合作的模式与做法，通过“印非峰会”、“韩非峰会”、“土非峰会”、“阿拉伯非洲峰会”等形式，开展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开拓了发展中国家南南互助发展的新局面，也增加了非洲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的博弈空间和谈判筹码。因此，作者强调，中非发展合作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其为中非双方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彰显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对世界发展进程的独特推进作用”。^①

同理，非洲的发展问题不再是非洲国家一国一地的发展，而是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问题，值得整个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为之努力。鉴于中非发展合作对当前非洲发展和世界发展所具有的示范作用，作者甚至大胆预测，“中非发展合作将有助于世界发展问题的最终解决”。^②当然，中非发展合作能否最终帮助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发展难题，还有待于历史进一步应证。然而，中非发展合作寻找到了—条促进世界发展的新途径，给非洲国家带来了发展的希望，却已是不争的事实。

彰显学术研究的经世致用功效

理念重构与战略拓展，必然带来新的行动方式与政策实践。外界之所以对中非关系保持着持久的兴趣，其原因也许不仅在于中非关系在中国外交中所具有的重要理论和战略意义，而且还在于非洲政治和中非关系中出现的此起彼伏的热点问题。《中非发展合作》一书的下篇从政策分析与选择的层面阐释了这些广受关注的现实热点与焦点问题，呈现出学术研究济世安邦之志向与抱负。

但政策实践领域的选择与评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随着近年来中非关系的迅速提升，中非合作关系涉及到的问题日显复杂与具体。比如，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纷纷提出与中国在非洲开展三边合作。西方一反过去强烈批判中国在非洲的“掠夺资源”、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论调，转而开始谋求与中国在非洲问题上的合作。西方为何突然如此高度“关注”中非关系？这是西方社会对于中非关系的“回心转意”，还是另有图谋。作者认为原因

① 刘鸿武、罗建波著：前引书，第6~7页。

② 同上书，第208页。

有二：一是近年来非洲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相对回升；二是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非关系的全面提升对国际秩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荡性影响。^①

显然，西方社会对于中非关系迅速提升的恐惧并未消除，三方合作的主张只是西方应对中国在非洲势力不断增长的一种应对策略。对此，作者提出“于分歧中寻求共识，在差异中寻求合作”的建议。^②但是，合作并非易事，因为中国和西方在非洲问题上看法迥异。首先是与非洲关系定位不同。数百年的殖民经历使西方与非洲形成了一种垂直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不仅影响了几百年非洲历史的进程，更让西方国家对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保持着支配性影响与垄断，而目前西方并不愿意放弃这一关系。相反，由于政治上“患难与共”的历史记忆、政治领域的“平等观念”、经济交往中“互利共赢”，中国具有不同于传统殖民者的身份和姿态。其次是发展理念上的差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便在倡导所谓“华盛顿共识”，不顾非洲国家实际国情，强迫其实施“经济结构调整计划”、“政治民主化改革”以及“良治”等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中国则基于自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主张非洲国家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源自本土的发展模式，这被西方学者称为“北京共识”之部分内容。第三，在外交原则上，中西方的差异依然巨大。受到政治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西方以援助为武器，强行向非洲国家推销人权、民主和良治等价值观念。中国则坚持将“不干涉”原则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立国之本，并不试图在对非洲外交中将政治与经济挂钩。

既然中国与西方在对非洲政策上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观念差异，中西方是否还有可能在非洲发展问题上采取合作呢？西方与中国的合作是否另有图谋？在作者看来，只要双方诚心合作，这些差异和分歧并不足以阻挡合作的步伐。对此作者开出的药方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主张中西方超越相互猜疑和彼此分歧，争取在合作中的多方共赢。^③

作者进而对中西合作推动非洲发展的原则与方针、领域与路径、机制与主体进行了探讨。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提出这些建议时，对于西方社会怀

① 刘鸿武、罗建波著：前引书，第317~318页。

② 同上书，第320~326页。

③ 同上书，第327页。

有一种理想色彩的期待，期待西方“及时转变思维观念，由僵化的、片面的甚至带有冷战遗留色彩的认知方式向更为开放的、合作的、多方共赢的方向转化”^①，这种建议对于三边合作的推进是非常必要而有意义的。然而，这种转化实现的前提是西方国家能够与中国一样，以非洲的发展为出发点来看待这种合作，真正倾听来自非洲的声音，充分考虑非洲的利益和发展需求。正如作者指出的，“应承担西方国家对非洲外交存在相当的善意”，^②西方已经意识到，多边合作将是未来对非洲政策不得不采取的应对之策，垄断性利益的思维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但问题是，西方对于非洲外交所存有的善意到底有多大。在现实的三方合作中，西方对于自身利益的保护可能远远大于对非外交中存有的善意，隐藏在西方国家利益中的合作谜底可能比它所表现出来的合作积极姿态要深得多。这些问题仍有待今后的研究者和相关人士更深入的探讨和思考。

《中非发展合作》的缺陷与不足

刘鸿武教授和罗建波博士对本书中相关问题的合作研究，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了，因而这本著作中各部分的内容，包含了他们多年来出版的相关著作，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在非洲、欧美和国内召开的各类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及一些提交给政府相关部门的调研报告等等，呈现出两人在不同时期对于中非关系进行思考所做的艰辛努力，及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深化与拓展过程，可谓“十年磨一剑”的重要成果。

尽管如此，本书还是存在一些明显不足或可以改进的地方。第一，或许是因为本书是两人合作的作品，作者在最后的统稿工作中没有很好地协调好各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造成了文章某些部分的重复。比如，作者在第九章介绍了中非合作关系的演进过程，而第十五章再次介绍中国援非政策的阶段性演变，虽然一个为合作关系的演进，一个为援非政策的演变，措辞有所不同，内容却大同小异。^③类似的问题，稍加注意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第二，在世界局势快速变化的今天，中非关系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与日俱

① 刘鸿武、罗建波著：前引书，第329页。

② 同上书，第330页。

③ 参见同上书，第175~195、297~301页。

增,且日益与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对非洲工作相联系,正基于此,中非关系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关乎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实践问题。目前本书较多地偏重于理论方面的探讨,学术性比较强,要将这些理论性和学术性的概念和思想付诸实践,用于解决和应对当前中非关系中所面临的诸多复杂的现实问题,依然有一定的难度。在介绍了宏观理论和战略后,本书专篇探讨了中非合作关系的政策,但书中所涉及的国别研究和案例研究较少,对于那些期待将理论问题运用到实践问题的解决中来的读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如果能够适当地增加一些具体的国别研究与案例分析,将理论思考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本书将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资政价值。

第三,本书书末缺乏一个便于读者进一步跟踪研究的专题参考文献和主题索引。事实上,本书引用和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研究者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中非发展合作》还承载着另一个任务,即启悟后来的研究者,因此,一个全面的参考书目和主题索引尤为重要。这项工作虽然复杂而琐碎,却恰恰能为该领域更深入和更深层次的研究提供最具参考价值的学术资源。

当然,当前中非关系现实问题纷繁复杂,与之相对应的研究任务也极为庞杂,单凭一两个研究人员、一两部研究作品可能无法解决当前中非关系中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也不可能凭借一部作品来满足所有读者的期待,只有更多的中非关系研究领域的新生力量加入进来,写出更多的著作方能满足不同读者群的需求。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